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
ECONOMIC DEVELOPMENT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

王曙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王曙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301-05944-2

I. 金… II. 王… III. 金融-经济自由化-研究 IV. F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820 号

书 名: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王曙光 著

责任编辑: 叶 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944-2/F·05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版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刷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5 印张 304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2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内 容 简 介

本书研究金融自由化的一般理论问题,系统考察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内容包括:金融自由化之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视阈的解读;金融市场的制度性体系与金融效率的制度源泉;金融抑制的内在逻辑及其经济绩效的历史性评价;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学术贡献及其内在缺欠;金融自由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金融脆化与制度质量问题;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功能与政府行为分析;转轨经济中金融自由化的路径选择与未来趋势。本书在借鉴大量国际学术界最新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对于促进金融自由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本书荣获“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

目 录

1. 引论 金融自由化：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解读	(1)
1.1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自由主义	(3)
1.1.1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沉浮	(3)
1.1.2 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自由与国家	(8)
1.2 政府行为、市场失败与公共选择	(16)
1.2.1 政府与公共选择过程	(16)
1.2.2 信息问题、市场失败与政府行为	(18)
1.3 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理论与经济史	(21)
1.3.1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及其演变	(21)
1.3.2 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路径依赖	(23)
1.4 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	(25)
1.4.1 转轨经济学：“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	(25)
1.4.2 发展经济学与政府	(29)
1.5 20 世纪末期的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	(31)
1.5.1 全球性变迁的经验与教训	(31)
1.5.2 方法论和基本框架	(33)
2. 金融市场的制度性体系	(37)
2.1 理解金融市场：制度安排与价格信号	(37)
2.2 理解金融市场：投资与储蓄过程	(40)
2.3 理解金融市场：交易的收益和交易的形式	(42)
2.4 金融市场的制度性体系	(46)
2.4.1 政府、企业和中央银行	(46)

2.4.2	金融中介机构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47)
2.5	金融市场结构变迁和金融效率的制度源泉	(50)
2.5.1	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	(50)
2.5.2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功能	(52)
2.6	结论：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功能 与效率源泉	(54)
3.	金融抑制及其经济绩效	(56)
3.1	金融抑制的经济根源	(56)
3.1.1	金融抑制的内涵和传统解释	(56)
3.1.2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金融抑制的内在逻辑	(58)
3.2	金融抑制的内容及其经济绩效	(61)
3.2.1	利率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61)
3.2.2	其他金融抑制政策的经济后果	(65)
3.3	政策性金融与金融抑制	(68)
3.3.1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与功能	(68)
3.3.2	政策性金融向金融抑制的可能过渡	(70)
3.4	金融体系中的政府干预与金融体系的效率	(74)
3.4.1	政府管制与金融部门的效率	(74)
3.4.2	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和专业金融机构	(76)
3.5	结论：金融抑制的历史性评价	(79)
4.	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轨迹及其评价	(81)
4.1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理论的早期文献	(81)
4.1.1	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	(81)
4.1.2	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	(83)
4.1.3	金融体系中货币功能的新考察	(86)
4.2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89)

4.2.1	麦金农和肖的主要理论观点	(89)
4.2.2	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和肖的债务中介观	(94)
4.2.3	金融深化的政策工具和路径设计	(98)
4.3	“麦金农—肖学派”的理论进展	(100)
4.4	内生增长理论与金融自由化	(106)
4.5	结论：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简要评价及发展趋向	(109)
5.	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分析	(112)
5.1	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12)
5.1.1	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112)
5.1.2	基于经验研究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118)
5.2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化	(123)
5.2.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化：理论和经验分析	(123)
5.2.2	制度质量、银行特许权价值与金融自由化	(128)
5.3	亚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131)
5.3.1	亚洲国家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韩国	(131)
5.3.2	亚洲国家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	(140)
5.4	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及其绩效	(145)
5.5	新兴市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	(151)
5.6	结论：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收益与成本	(157)
6.	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160)
6.1	金融市场中的政府功能	(160)
6.1.1	金融市场中的市场失败	(160)
6.1.2	金融市场中政府的制度功能	(166)
6.2	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行为	(170)
6.2.1	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	(170)
6.2.2	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	(176)

6.2.3	金融自由化与政府宏观经济控制	(184)
6.3	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197)
6.3.1	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与金融管制 (以马来西亚为核心)	(197)
6.3.2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再次争论	(202)
6.4	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货币制度	(209)
6.4.1	国际金融组织与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危机	(209)
6.4.2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平衡性	(219)
6.5	结论：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对金融自由化中 政府作用的再估价	(222)
7.	转轨经济与金融自由化	(231)
7.1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抑制和金融风险	(231)
7.1.1	转轨经济中金融抑制的经济根源： 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	(231)
7.1.2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及其制度基础	(235)
7.2	转轨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路径选择	(239)
7.2.1	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	(239)
7.2.2	经济转轨和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制度主义观点	(245)
7.3	中国的经济转轨与金融改革	(254)
7.3.1	中国金融改革：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	(254)
7.3.2	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和金融改革 的收益成本与未来趋势	(262)
7.4	结论：再论“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	(269)
参考文献		(275)
后记		(298)
再版后记		(302)

1. 引论

金融自由化：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解读

金融自由化是一个涉及广阔经济思想背景和经济史背景的题目，尽管金融自由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非常年轻，但它牵引出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哲学话题却几乎可以涵盖整个经济思想史的主题，这是其作为研究对象引起研究者浓厚兴趣的主要原因。将某种具体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理论的全部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割裂开来，我们会经常感到迷茫和困惑，看不到这种理论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经济背景；实际上，任何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经济理论，不外乎是以往某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明显的或者隐藏的延续，同时，该种似乎新颖的经济理论亦不可能逃脱和背离当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而独立存在。因此，假如将该理论置于更为广阔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视阈之中，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把握该种理论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历史地位，并必将对其发展趋势和前景有更清晰和准确的把握。

金融自由化就其内涵而言不能脱离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个古老但却重大的经济学命题的讨论，而整个经济学说史几乎贯穿和充满着经济学家们对这两个命题的纷纭的观点。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而言，金融自由化理论毋宁说是经济思想史上经济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的具体化的延续，因此金融自由化思潮从基本命题、基本理论假设和基本理论倾向上没有脱离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关于金融自由化的一切争议，尤其是在 20 世纪末期金融危机浪潮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下关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质疑、批判与修正，亦不过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悠久的消长关系在当代金融领域的一种延续。因此之故，我们在引论中将梳理经济思想史中两种思潮的变迁轨迹，以此试图揭示金融自由化思潮的理论渊源，并对当代关于金融自由化歧见纷纭的现状做出宏观的思想

史的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自由化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不能离开对于政府行为的探讨,而所谓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进程,不外乎是政府行为随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而不断加以调整的历史进程,是政府管制方式和范围的不断变迁和政府逐渐向市场进行金融控制之权利让渡的过程。政府在金融控制的力度、手段、范围以及持续时间等方面的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公共选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是涉及该过程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博弈和重新缔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政府行为的理想化的理论假设将被抛弃,而代之以处于“真实世界中的最大化者”这样一个符合经典经济学关于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因此,在引论中,我们还将探讨政府行为和公共选择问题,以期对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变迁有更为深刻的把握。

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审视金融自由化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视角,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经济和金融制度的不断演进和变迁的进程,也是在金融体系内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因此,探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金融自由化进程和基本特征的理解。而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于金融自由化的次序和制度安排的探讨,是与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渐进主义模式和激进主义模式孰优孰劣的探讨相联系的,也是与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探讨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将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术语和分析框架,对金融自由化作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解析。

在探讨金融自由化的时候,尽管我们不可能避开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讨论,但是,我们理论研讨的重点应该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主要鹄的,也是在于揭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抑制的弊端,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深化的次序和途径,以期在最大可能地避免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的前提下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由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学革命,为我们客观和科学地把握金融自由化奠定了基调,尤其是加深了我们对于金融自由化次序和渐进性的认识,加深了对于金融自由化过

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国之间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识。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典型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最可靠和最真实的样本。引论最后一部分将探讨 20 世纪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

1.1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自由主义

1.1.1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沉浮

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一篇演讲《经济学与政治学中的看不见的手》中,曾经引用了英国法学家 A. V. Dicey 于 1899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分析了决定政府政策的各种要素以及公共观点(public opinion)在形成这些政策中的巨大作用。^①Dicey 的核心论点是,立法行为影响公共政策,而公共观点会影响和左右立法行为,当公共观点发生变迁的时候,立法行为就会随之发生转移,从而公共政策也会发生变化。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也以不同的方式发表了同样的论点:“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获得政见,然而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前某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中汲取而来。”^② 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恰恰是当代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两个旗手,从他们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一时期的经济思潮和经济理论会形成一种流行于社会的公共观点,而这种公共普遍接受和被大量传播的公共观点会对当时或者若干年后的公共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和

^① 参见 Milton Friedman (1981): *The Invisible Hand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ung-hua Series of lectures by invited eminent economics, No. 3, Taiwan. Dicey 的著作是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99).

^② 同上。

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正是经由了这样的途径。而金融自由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至于今天的实践,也印证了以上的论断。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沉浮消长,始自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滥觞时代。综观整个经济思想史,这两种思潮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此消彼长的状态,这种互为消长的趋势是与不同时代的经济形态和发展状况相联结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所指出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趋势的变化”^①,这个论断正确地阐明了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完美的经济思想,可以长久地绝对性地在任何经济时代都占据优势的统治性的地位,验之于经济思想史,这个论断是可以得到历史支持的。

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陈岱孙先生曾经在一篇经典性的文献中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下过精辟的定义,并对这两种思潮在历史上的消长关系作过系统的考察。^②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即是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品市场的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机制和竞争力量所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极少量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所谓国家干预主义,则是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涉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职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最早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尽管在许多有关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并没有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滥觞时期,而被贬抑为现代经济学的史前期思想(pre-historic thoughts),与此同时,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几乎都一致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教授的《国民财

①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② 参见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1984 年 8 月),收于《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这篇经典性的文献是迄今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消长趋势的最为集中、深刻、系统和权威的论述,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过深刻影响。

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作为古典经济学派鼻祖的斯密所提出的基于国家契约理论和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学说,是对于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经济主张的一种反动,而这种经济思想上巨大变化的根源,仍然在于17世纪末期以后以至于18世纪中期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地位的变化。

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派对于作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市场机制的膜拜,其理论基石有四,即他们相信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里,公私利益必然是协调而不是冲突的,市场可以自动地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均衡价格可以指引不同产品的相对生产数量和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最适度分配,同时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分配的公平性。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这些假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证明和系统的论证,但是,经过李嘉图(D. Ricardo, 1722—1823)、约翰·穆勒(J. S. Mill, 1806—1873)和巴斯夏(F. Bastiat, 1801—1850)等后古典学派的发挥,中间经过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学派(Marginalism)在分析方法上对古典学派的补缀^①,再次经过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为代表的新古典派的折中式的整合工作,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最终成为主宰欧美的正统的主流经济思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自由主义从来不是没有遇到挑战,福利学派对古典理论中“最大化”的质疑以及剑桥学派对完全竞争的假说的质疑,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危机。

假如将眼光从欧洲的发达国家转移到欧洲比较落后的德国,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与流行于英法等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相对立的另

^① 虽然边际学派表面上在价值问题上与古典学派似乎处于对立的地位,从而被称为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但就其整体的理论立场而言,边际学派却是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对传统的古典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技术上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不管是瓦尔拉斯(L. Walras, 1834—1910)还是其继承人帕累托以及美国边际主义者克拉克(J. B. Clark, 1847—1938)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非攻击者,因此这种所谓革命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而非哲学基础意义上的革命。关于边际学派的最详尽的论述,参见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一种经济思想的传统,那就是可以与欧洲经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以主张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有效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德国浪漫主义、国家主义和历史主义学说。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是这个理论的最集中和最典型的体现者,他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和产业资本薄弱的具体经济现实出发,认为应当重视政府在保护国内产业和扶植经济成长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因袭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国家主义的经济学说出现在经济落后的德国,似乎暗示着某种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中的一般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越是在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出发,就越是强调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是主张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和计划化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竞争。这几乎成为一切面对经济赶超使命的国家的一致经济政策取向。这个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规律在我们分析经济落后国家所采取的金融管制和金融抑制政策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也同样适用。

经济自由主义所受到的最致命的攻击来自于凯恩斯,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萧条为凯恩斯登上经济学的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这段历史已经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所熟知。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中,以就业不足均衡来反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提出克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成为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在事实上使得欧美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提出了挑战,它在某一时期成为取代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正统和主流思潮,而即使在凯恩斯主义遭受攻击的时代,国家干预主义也理所当然地与经济自由主义处于分庭抗礼的同等地位,直到今天,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仍然是一种强大的足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经济思想。如果我们追溯金融理论和金融控制的实践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为了尽快摆脱经济萧条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和金融系统的再

次崩溃,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金融管制政策(如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和对利率的管制等),以维护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些带有强烈国家干预经济迹象的金融控制政策,成为后来金融自由化的最初的改革目标。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学说因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滞胀”(stagflation)现象的解释乏力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其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最为著名。这些学派是对凯恩斯革命的一次“反革命”,试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但是经济自由主义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干预主义而形成独霸经济学天下的局面,在20世纪末期,经济学中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同时存在。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政策而言,其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倾向是非常清晰的。^①联系到金融领域,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滥觞的时期,也是金融自由化理论最初萌芽和成长的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②实际上,我们未始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论看做是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金融领域内的一个理论分支,在一些原则性和根本性的政策主张上,金融自由化理论(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是一脉相承的。以在20世纪末期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为标志,一场大规模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变迁为新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近10年的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使得学术界对于以自由化、市

① 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低迷使得经济自由主义遭受谴责,而新凯恩斯主义又重新得到重视,克林顿政府在经济调整方面采取的以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的做法,有较强的凯恩斯主义特征。参见徐滇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第18—19页。

② 例如金融自由化理论最初的代表人物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和肖(Edward S. Shaw)的关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代表作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参见 Ronald I. McKinnon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Edward S. Shaw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场化和私有化为基本目标的带有经济自由主义印记的经济转轨模式产生了质疑。在金融领域,20 世纪末期带有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开始反省早期的建立在新古典假说基础上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适度的金融控制、金融自由化中的渐进主义以及对政府角色的重新确认,成为 20 世纪末期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基本特征。

1.1.2 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自由与国家

在探讨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之前,我们回顾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这个曲折的发展进程表明,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潮并非具有先验的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意义,而是由一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和塑造的一种社会思潮。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国家,经济自由主义会成为占据绝对优势的主流思潮,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和一些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会代替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正统学说。对经济自由主义怀着宗教信仰式的虔诚心态的经济学家们,会夸大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验性质,他们将经济自由主义视为先验的抽象的不证自明的信仰,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渐进性、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等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极易采取教条的立场,指导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的西方设计者和经济顾问们按照新古典教条对转轨路径的设计,成为经济自由主义屡遭学术界诟病的把柄。在我们所处的 21 世纪初期,世界上顽固坚持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恐怕已经很稀有了,但在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许多命题上,经济学家还远未达成有效的共识。在这里,我准备选取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三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亚当·斯密、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来展开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有关命题的分析,以期澄清许多模糊的混淆的认识。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占据着显要的位置,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经济学的先驱者,他对经济学的历史以至于近代世界经济政

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然而斯密长久以来遭受的误解和非议恐怕与他受到的赞誉同样多。在这一点上，斯密的命运与经济学说史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有些类似，尽管他们的理论立场和学术思想迥异，可是他们都是开宗立派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人，都享有本派别的思想家们的近乎宗教式的推崇，同时也都遭受着长期的学术的以及非学术的非议。^②斯密所处的时代，是所谓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大约是从1688年英格兰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到一个世纪后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前后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欧美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如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德国的康德(Kant)，英格兰的洛克(Locke)、柏克(Burke)，苏格兰的休谟(David Hume)、斯密以及美国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由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成为这个时代普遍的公共观点(public opinion)，而对“人类本性”(human nature)的重新估价和定位成为这个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核心命题。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把“激情”(passion)(即感觉和情感，feelings and emotion)置于“人类本性”的核心，他们不是把“激情”作为一种可以原谅的事实，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事实来看待。有学者发人深省地指出，斯密最重要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思想——即神性对社会生活机制的非直接的介入——是建立在人类理性(human reason)不能自行达成社会和谐的理念之上的。理性固然有其作用，但是激情却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石和驱动力量。^③自利(self-interest)和利他主义(altruism)的同情心同

① 直到现在，斯密的名字在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著作中也是最常被引用的名字之一。据统计，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4版中，亚当·斯密的名字被引用了15次，而密尔被提到9次、马歇尔9次、帕累托3次、瓦尔拉仅1次。参见 *Adam Smith's Legacy: Hi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Edited by Michael Fry(1992),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 57。另外，在中国，斯密也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今年，北京大学召开了纪念《国富论》中文版诞生10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翻译斯密这部著作一个世纪后，这个研讨会的召开无疑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② 参见 *The Essential Adam Smith*, Edited by Robert L. Heilbroner, Penguin Books Canada Ltd., 1986。

③ 参见 *Adam Smith's Legacy: Hi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Edited by Michael Fry(1992),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 3。

是人类本性,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人性的统一与协调,在斯密看来,须借助于一种更高的原则,即“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①因此,在斯密早期的可以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相提并论的伟大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就一再贯穿着“看不见的手”的主题,而所谓“看不见的手”^②,即是“自然之主宰”在人类本性的理智能力非常脆弱的前提下保证人类实现其目标的途径。基于这种思想,斯密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坚信人类社会的延续与繁荣是与严格的社会秩序和对于财产原则的维护分不开的。这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原则高于人类自身的理智,它在人类生存中完好地整合了人类的矛盾本性,从而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看不见的手”。因此,理解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以及“自由放任”思想,如果同他坚持的“社会秩序”(order of the society)思想^③和“社会连续性”(social continuity)思想割裂开来的话,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而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经济秩序”(economic order)也是一个核心的主题,因为斯密已经发现,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自我管理(self-regulating)会对“经济秩序”带来最大威胁。因

①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137. "It is reason, principle, conscience, the inhabitant of the breast, the man within, the great judge and arbiter of our conduct."

② 关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1960年,被解释为“市场价格机制通过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创造一般均衡”,人们没有注意到,其实斯密所有的著作都反对对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所作的传统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解释。参见 Jan Peil (1999): *Adam Smith and Economic Science: A Method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Edward Elgar Press, p. 9. 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里,就把斯密的学说看做是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前驱,见 J. A. Schumpeter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p. 999. 在亚当·斯密所有的著作里面,提到“看不见的手”只有三次,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IV)(1759)里面,一次是在《国富论》(IV)(1776)里面,第三次是在《天文学史》(1795)里面,学者 S. Ahmad 认为还有第四个“看不见的手”,因为他发现至少在《道德情操论》里面,“看不见的手”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在这些论述里面,斯密并不是将“看不见的手”作为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的阻碍者和扰乱者,而是自然秩序的维持者和执行者。参见 S. Ahmad: "Adam Smith's four invisible hand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22), p. 137. 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另外的解释,可以参见 *The Invisible Hand*,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Eatwell etc., The Macmillan Press, 1987, pp. 168—172, "Invisible Hand", written by Karen I. Vaughn.

③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226.